



■全國政協禮堂。

資料圖片

首屆全國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

1949年9月21日到30日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當時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下，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揭開了中國歷史的第一頁。

會議通過了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三個都是為新中國奠基的歷史性文件。會議還通過了關於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等重要決議，並選舉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新政協的成立，標誌着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

利，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完全形成，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協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推動各項社會改革、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作出了歷史性貢獻。1954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通過並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至此，作為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圓滿完成其歷史使命而載入史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繼續存在。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以及對外友好交往活動中繼續發揮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作用，為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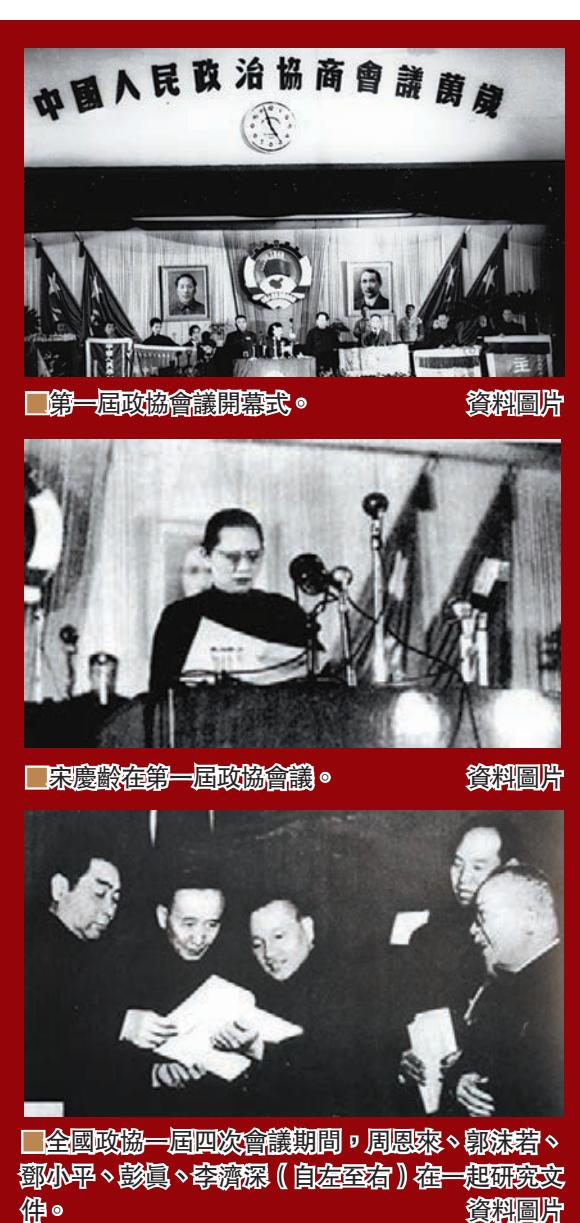
緣起宋慶齡
中國政協組織由界別組成，歷屆政協界別隨着國家形勢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不斷進行調整。到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共設34個界別，其中特別邀請人士界別，則是專為宋慶齡從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就設立的。

1949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便聯名寫信給留居上海的宋慶齡，邀請其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宋慶齡接到信後，因當時身體不適，不宜旅行，暫時未能動身。

上海解放後，鄧穎超專程前往上海迎接宋慶齡。鄧穎超介紹了新政協的籌備情況，轉交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並說：「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在北平召開，中央人民政府也將正式建立。黨中央、毛主席懇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國大計。」

經過深思熟慮後，宋慶齡同意接受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隨鄧穎超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當時，有3個單位都提出要推宋慶齡為代表，宋慶齡表示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體的業務，也不願參加任何團體，只願以個人旁聽的資格列席新政協會議。於是，鄧穎超提議：「以宋為特別邀請代表，請中央決定。」後被中央採納。

為此，新政協代表中特設了「特邀代表」一類，其中有宋慶齡、陶孟和、張難先、張元濟、張治中、邵力子、程潛、傅作義、周信芳、梅蘭芳、賽福鼎等。



「新政協」與「舊政協」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又稱「新政協」，以別於1946年1月召開的「舊政協」。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重慶談判，決定為組建新政府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和社會賢達五個方面，時稱「政治會議」，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加上「協商」二字，於是中國有了「政治協商會議」。同年11月，國民黨撕毀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單方面宣佈召開「國民大會」，遂使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解體。

1948年，中國共產黨號召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以擴大、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49年8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討論政協組織法草案時，周恩來提議新政協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被採納。他說：「在人民民主國家中需要統一戰線，即使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有與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要合作，就要有各黨派統一合作的組織，這組織就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要長期存在下去。」

話你知

民主人士自港北上 排萬難助力新政協

從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召開至今，人民政協已走過67年光輝歷程。67年來，人民政協積極投身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探索改革路、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建立了歷史的功勳。而在67年前新政協籌建之初，許多民主人士正是從香港出發北上，一路橫風沐雨，冒着生命危險前往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並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完成建國大業，其中不少民主人士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要職，功績卓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當時，香港與解放區之間的陸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斷。周恩來最初曾經試圖開闢「香港—英國—蘇聯—哈爾濱」的專門路線，但並未獲得港英當局同意，後最終決定開闢從香港坐船到大連或營口進入解放區的海上通道。

民主人士分批北上 冒險喬裝離港

從1948年到1949年，民主人士分批從香港安全抵達解放區。首批北上的有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10餘人，乘坐租來的蘇聯「波爾塔瓦」貨船。為安全起見，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運走，自己離家時只帶一個小提包，並化裝出行。1948年9月12日上午，這艘具有特殊使命的貨船向北出航，經台灣海峽、大連，朝鮮羅津，在海上航行18天後，到達哈爾濱。

而第二批11月23日出發的民主人士，則乘坐由新開設的「華潤公司」租借掛挪威國旗的貨船，船上有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沙千里等人。第三批北上民主人士人數眾多，有李濟深、茅盾、柳亞子、馬寅初、翦伯贊等30餘人。貨船於12月26日晚從香港出發，民主人士打扮成經理、客商、學者等各種類型的人物，秘密北上。

民主人士甫一到達解放區，就投入到新政協和新中國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中。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黃炎培、郭沫若出任政務院副總理，15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長，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委員。民主人士和中共一起完成了建國大業。

假借參加宴會 李濟深安全離港

作為香港《文匯報》首任董事長的李濟深(1885-1959)，是香港北上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中的重要人物。歷經艱險，終於在1949年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

原籍江蘇的李濟深，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留學日本，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1948年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除與中共聯繫密切外，與港英當局和美國領事館也接觸頻繁。白崇禧曾親筆寫信給李濟深，請他到武漢「主持大計」。因此李濟深位於香港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的寓所也一直處於被監視狀態。港英政治部專門在李濟深寓所的馬路對面租了一層樓，派特工人員住在那里，名為「保護」，實則監視。

為令李濟深順利離港北上，負責民主人士北上的中共工作組大費周章，詳密研究，決定安排李濟深在1948年



■李濟深 資料圖片

聖誕節次日夜間上船，12月27日凌晨駛離香港。12月23日，時任香港《華商報》董事經理楊奇接到任務，負責運送李濟深的兩件行李，並負責護送李濟深等人以參加宴會為掩護，登上了蘇聯合營的貨船「阿爾丹」號。

這艘載着李濟深、茅盾、柳亞子等30多人的輪船，途中遇到大風浪，耽誤不少時間，航行12天後終於在1949年1月7日上午抵達大連。周恩來知道情況後非常着急，曾幾次去電詢問，直到民主人士安全抵達才放心。由於正值隆冬時節，周恩來指示工作人員，事先為民主人士準備了禦寒的皮衣等，讓一路顛簸的民主人士倍感溫暖。

領導人論政協

■毛澤東

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

■周恩來

要讓黨外人士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使他們在各種會議上敢於說話……他們說的話不一定都對，但只要有一點好的，我們就應當重視。願聽意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須去聽，特別是要能聽不同的意見。

■鄧小平

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

■習近平

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在中國，這兩種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特點和優勢。

■俞正聲

廣大政協委員要積極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充分發揮委員主體作用，做到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堅持建真言、謀良策、出實招。